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八八期 ——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3d)

【一家之言】	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兼论创立“江青学”	阎长贵
【当事者言】	记张春桥阴险狡诈表现的若干事例	刘 岩
【史海钩沉】	华国锋何时约见李鑫	李海文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一家之言】

### 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兼论创立“江青学”

• 阎长贵 •

蓝苹是江青二十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艺时的艺名，虽然她从艺时间不长，但很快进入了明星行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变成一个口含天宪、震惊中外的大人物，“搅得周天寒彻”。“文革”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中非研究不可的一段，而要研究“文革”，江青是绝然绕不开的人物——因为她是“文革”的符号和象征。邵燕祥先生建议创立“江青学”，我赞成这个创议——当然是作为“文革学”的一部分。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件事相较，他更看重第二件事。如果说，没有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镌有江青印记和痕迹。“江青学”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本人不揣疏漏，仅陈鄙见，作为研究和讨论这个课题的引玉之砖。

#### 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和毛泽东究竟谁利用谁？

江青政治生涯的重头戏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是毛发动“文革”的同伙，即毛泽东开展“文革”最忠实的始终不渝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在他们二人之间有一个问题需要面对，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和毛究竟谁利用谁？对这个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说：“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简单地说，就是被林彪、江青利用。

我们姑且不谈林彪。说江利用毛符合事实吗？从根本上说，不符合事实。

毛和江是夫妻，而在“文革”中，他们的关系基本是政治关系，江无疑有利用毛的时候和地方。她经常自称代表毛问候群众，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时，她一天不知说多少次：“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据江最后的一位护士长马晓先说，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江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毛泽东明明说了：江“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仍然这样说。这次在小靳庄，她还叫邢燕子、侯隽两人代表青年给主席写信，并说：“你们在信封上写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就可以了。”

江在“文革”中经常向人们说通过她可以向毛反映问题，她也确实帮忙反映过问题或转送过材料。如1966年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会议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通过江向毛递交了反映他们受压的信和他们写的两篇关于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毛8月1日即给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而又后果严重的信——这是毛“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正如毛自己所：“……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

在“文革”中，江就是这样精心地利用和毛的夫妻关系，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说，江作为毛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此话一点不假。“狐假虎威”，这在江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江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并不一定知道的坏事，如抓保姆，迫害文艺界或其他领域的这个或那个人，她不仅利用了她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要知道她这个身份也是毛给的），同时，也利用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围和环境，尽管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报告毛。

上面说的是江在“文革”中对毛的利用，而在“文革”中毛对江的利用那是更重要的事情。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是背着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实际上即背着中央，利用江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毛没想到的顽强抵制；毛的性格“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他，又出新招。这就是，他利用江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其重要内容就是把林彪拖上“文革”战车，也是把江送上政坛很关键的一步棋，以使江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并任命江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掌控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对江最大的利用。

毛在“文革”中对江极其信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给江写信讲“黑话”（毛泽东语），和1967年8月4日又给江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向政治局传达，和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也不负毛的“厚望”，毛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或是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

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江都是积极响应，全力执行的，所以毛称赞江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当然，毛对江也有不满的地方，也不时地批评她，甚至还让政治局开会批评她，但他对江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这从他请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而然后又告诉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在“文革”后的一次聚会中，我亲耳听江的护士长马晓先说，有一次，李讷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经常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有那个本事。”江青的警卫员姜宝元也讲李讷说过类似的话：“你想当武则天，你知道武则天她怎么坐天下的？她依靠手下两员大将给她支撑着才坐的天下，而你，谁支持啊？”我看，这话只有她亲生女儿李讷敢说，恐怕连毛远新都不敢说；不过，我觉得，李讷反复这样说也是传达她爸爸毛的意思，否则，她虽然敢说，但也不至于反复说。大概就因为这样，即江既没有武则天的本事，也没有武则天的“人脉”，毛最终没有把大权交给她（毛原来可能有让江青接班的打算）；但尽管如此，江作为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是毛，也是江的命根子）的人，毛对她还是十分信赖的。所以，笔者认为，毛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连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1976年10月华国锋等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顺应民意、违反毛的意愿的行动，但却打着毛主席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时这样说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后来也就逐渐不这样说了。

毛从来没有要打倒江。江对毛也是忠贞不二、始终如一的。在说到江和毛的关系时，江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中说：“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最后作陈述的《我的一点看法》中，她又说：“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江辩护词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和毛关系的真实写照。毛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的话。

有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将军生前著书说：江青和毛泽东“背道而驰”，这完全是罔顾事实的一种说法，不会，终究不会被历史和人们所认可。

## 二、从蓝苹到“文革”中江青有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那么，江年轻时就是一个坏人吗？我认为不能这样说。

江青，并不是其人的本名，而是她1937年到延安后所选用的一个名字。她童年读书时，老师给她起的名字是：李云鹤。这个名字一直叫到20多岁，上世纪30年代到上海后还这样

叫——当然，江青为了做地下工作方便也叫过其他名字，写文章还用过这样那样的笔名。30年代中期，她从事文艺工作，如开头所说，她以“蓝苹”的艺名行事。江出身低微，其父是一个做大车轮子的木匠，江青自称“轮人之女”。江1933年离开青岛到上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又离开上海去延安。怎样认识江在三十年代的思想行为，是全面和正确认识此人的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

江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30年代的革命经历，经常向人讲她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30年代另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她30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很多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就擢发难数。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相比，江青的30年代是最值得肯定的，它是江的“黄金年代”（这是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的说法）。而江为什么对她的三十年代又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共同的变态心理。

实话实说，江在30年代，主要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总的来说，此时的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的道路，是当时追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个30年代的报道和宣传多是负面的，从历史角度讲，并不符合事实。

国际友人白求恩对江的一段描述值得注意。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其中有专门段落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而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介绍白求恩这篇作品的薛忆沔说：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西方媒体上最早出现的对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会出现的将对未来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学生”的报道。从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跃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时看到的江，还没有和毛结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和毛在谈恋爱。

我认为，江从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比江青小两岁、在30年代曾是江青朋友的画家郁风说：30年代，“我印象中她（指蓝苹，即江青）非常敏感，说话时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一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许多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从早就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看出来……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按：应为1938年——笔者）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

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李辉《郁风与蓝苹》，载《老照片》第3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郁风这个说法，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见、大智大慧，仿佛还没见别人这样说过。

### 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

1938年11月，在延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文革”后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和《毛泽东年谱（1893—1949）》说这是毛“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显然，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就因为江在“文革”中成为历史的罪人，毛在30年代选择江做伴侣就是“错误”和“失败”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毛和江都是发展变化的。回到30年代，即毛和江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是革命领袖，江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何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和江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的过去，毛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同江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现在很多人都说，江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这可能是事实，有一定的道理（电视剧《延安颂》就是这样表现的）。一次看电影时，江就曾跟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这句话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够印证前述说法。而江在《打渔杀家》中有比较好的受人欢迎的演技，显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上海从艺磨炼出来的。毛既然从《打渔杀家》的表演中对江有好感，“顺藤摸瓜”，了解了解江30年代的从艺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又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外（包括周总理，他是会议主持者）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主席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情的。”从毛对江《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实实不在乎许多人劝他不要和江结婚的那些理由。再从江方面说，应该明确，就是从婚姻上讲，她也不是为着追求毛才到延安来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而且当时追求毛的，也不只江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和江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

### 关于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没有“约法三章”？

翻阅文革后大量有关江和毛的回忆录、传记文学、纪实作品，在谈到江和毛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必须指出，这是“三告投杼”、“三人成虎”式地以讹传讹。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对这个问题我多次撰文辨证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央政治局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限制江青的“约法三章”（参阅我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中《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的问题》）。从2001年到2008年我著文反对所谓“约法三章”时，还不知道杨尚昆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我现在就把杨的观点引出来，以飨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和广大读者。

其一，文革研究专家金春明在《同舟共进》2008年1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可能是在公开报告和文章中较早谈及此问题（指“约法三章”）的人。1984年7月，在海军举办的一个报告会上，我作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的报告，曾言：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中央规定她的任务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她参加政治活动”，这个报告的录音整理稿经海军政治部印发后，在全国很多地方翻印，流传较广。大概由此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1985年7月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突然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办公厅，传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党校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很好。听说现在要出版，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说当时中央有个决定，可以结婚，但江青不能参政。我找了几个老同志问了一下，都说没有这回事。我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个事。请出版之前，将这个问题核实一下。”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同志把杨尚昆同志的指示转给我。此后，根据领导指示精神，在我的文章和报告、讲课中，都不再讲这个问题。

其二，《杨尚昆回忆：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遭忌恨》，其中有云：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张培森和程中原，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

杨说，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即张闻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指张闻天就很多人反对毛和江结婚的事给毛写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

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毛表示的就是洛甫。

刘英这时插话说：那时闻天是党的（总）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杨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

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

第二，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

杨说，陈云告诉我，当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后，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

江青把这事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到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啊？”

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

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

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想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

杨尚昆，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工作，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如此执着地关心所谓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事，坚决地一再地否定这件事，实在令人感佩。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应该认真地向他学习。在这个所谓的“约法三章”问题上再也不要以讹传讹了。

#### 四、建国以前的江青应受到肯定

江和毛结婚后，担负起了在生活上照顾毛的任务。并在他们结婚差不多两年后，即1940年8月生下了他们的女儿李讷。李讷是毛最小的孩子，她和毛的其他孩子不同，一直生活在毛身边，她是毛给予父爱最多的孩子。江和毛的夫妻关系存续了38年，应该说是始终不错的，毛不止一次跟别人说：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很有帮助。江也自诩是毛泽东的“流动哨兵”。江直言，她和毛是“政治夫妻”，诚哉斯言！江和毛之所以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不仅在于他们结成夫妻，而在于他们结成了政治夫妻。

江和毛作为夫妻，在4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毛和党中央率领军队转战陕北时，一直跟随在毛身边，担任中央直属支队的政治协理员，做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有时还帮助毛泽东起草文件和报告稿（毛口述，她记），作为中央领导夫人一级的女同志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江最值得肯定的一段光荣经历。江没经过长征，这是她和很多人（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大姐”）相比时一个弱点，但她常以随毛转战陕北自豪（甚至“骄傲”和大肆鼓吹），大概人们都记得在法庭上，江在辩护词中说：“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按：指坐在台上审判他的人——笔者）都躲到哪里去了？！”

转战陕北时，江青一直留在毛泽东身边。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描写转战陕北的电影《巍巍昆仑》虽然有毛泽东骑马行军的画面，在这个历史画面中也骑着马的江青紧随其后，然而，这个电影不仅没有提到江的名字，连一个正面镜头都没给她，实在不应该。政治常常歪曲历史，这恐怕就是一个不大不小而又很说明问题的例证。而这种例证并不是个别的。如石家庄制作的电视剧《毛主席在西柏坡》，有李讷的镜头，就没有江青的镜头——这种处理历史的办法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利益和一定的政治需要。无数事实证明，历史（和艺术）服务、服从于政治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观，即做到实事求是。查查历史，看看现实，在“实事求是”是所谓“党性”的美妙口号下掩盖着多少错误和罪恶。

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是不可能长久被掩盖和歪曲的。与《巍巍昆仑》不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时，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放的由王朝柱编剧的5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就用不少镜头和情节（有些是很重要的情节，如毛泽东嘱江好好照顾周恩来，在窑洞口或门口，迎接黄炎培、陈毅等）正面表现江；是否做得完全到位，不必去说，但这样做——敢于这样做，就是尊重历史的表现。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逐渐冷静和理智了。该电视剧播放后，王朝柱先生说：这是32年来（肯定从“四人帮”被打倒的1976年算起——笔者）江青第一次以正面人物出现。王朝柱先生这样做，其意义非同寻常。它表明建国前的江青是应该和值得肯定的。

这当然不是说，江青什么都做得对，在她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肯定也犯过这样那样以及或大或小的错误，但错误不等于“罪”；错误，特别是一般错误，不在我们讨论范围。

#### 五、江青崛起于“大跃进”失败后的六十年代

江在50年代，除了积极参加过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带队”（没这个名义，实际如此）做过“武训调查”外，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不多，因为她身体一直不好。从1949年算起，江曾四次到苏联治病。江崛起基本上是在60年代。这和毛所遇到的政治形势有关。毛发动和

领导的“大跃进”失败了，他和处于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产生了分歧——很大的分歧，他认定产生了“修正主义”，他感到孤立，要寻找新的根本的政治助手和支持者，即能和他一起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人。

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在探讨所谓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问题时，我曾问过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但几乎一致地回答我：《约法三章》这件事他们不知道；又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有什么限制，而是毛本人对江有什么限制。我很认同他们这个观点，认为对我探讨这个问题即“约法三章”问题很有启发。再说一次，杨尚昆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不止一次地表明对所谓“约法三章”的态度，坚决和明确地否定了所谓“约法三章”，但我不知道，所以我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探讨这个问题——这在历史研究中恐怕也是一个教训：信息应该及时公开，和及时交流；否则，不可避免地要浪费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再说一点，在探讨所谓“约法三章”问题时，我所以要问汪东兴、张耀祠，一则，因为我和他俩熟，他是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秘书时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支部，即包括毛泽东以及江青在内的支部；二则，我觉得他们长期在毛身边工作，他们的话有权威性，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但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对我探讨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毛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我从叶永烈先生向我推荐的一篇文章（郑克卿、常志《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党史博采》2005年第1期）中，受到启示，甚至应该说，对建国后毛、江关系，找到了比较客观和比较详细的说明。我深切地感谢郑先生和常先生，请允许我把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叙述摘要抄录在下面：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江青的批示、信函、电报、诗词或谈话多达77篇。这些文稿真实、客观地记录了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建国后不同时期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过程。同时，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建国后毛泽东本人思想上的变化。

1、从建国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严格的，对她尽管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无意支持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某种角色。

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然而，江青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照顾毛泽东的生活。1950年1月1日，她致电正在苏联的毛泽东，要求到新区去“看一看”。经过思考，毛泽东于1月4日致电刘少奇并转江青，虽然同意她去新区，但提出了多条具体要求：一是此行须得少奇等同志同意，二是“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去，”三是下去之后“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从这几条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四年后对游泳池问题的处理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1954年，江青擅自提议为毛泽东修建游泳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江青被迫于4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检讨。同月25日，毛泽东将此信批转刘少奇、陈云等人：“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5亿元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严格态度。

当然，这一时期江青的某些行为也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1951年下半年，江青参加了由文化部、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并参与起草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该文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亲笔作了15处重要修改。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对江青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毛泽东的态度是肯定的。但此事过了几个月，毛泽东便在一份关于拟任江青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报告上批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只得再考虑一下。”这显然有是一种审慎、严格的态度。



分析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文稿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涉及江青的文稿数量较少。从1949年到1955年，与江青有关的文稿只有4篇。第二，从涉及江青文稿的内容来看，以提出要求或批评的居多。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我们还看不出毛泽东有让江青登上历史舞台扮演某种角色的政治意图。这对江青起到了相当大的抑制作用，使不安分的江青难以按自己的意愿去主演或导演历史活剧。

2、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减少，政治上的关心、指导多了。

从1958年到1963年，是毛泽东对江青态度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从《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涉及江青的内容陡然增多。如前所述，从1949年到1957年，有关江青的文稿只有4篇，而从1958年到1963年，涉及江青的文稿则多达21篇。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它表明，毛泽东对江青政治上关心、教诲多了起来。

仔细分析有关江青的这些文稿，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指示江青阅读某些重要文章、文件或其他材料的批示占绝大多数。在所有21篇文稿中，除1961年9月9日为江青写的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及1962年5月12日代江青草拟的一封信给陈宗娥的回信外，其余19篇均为转给江青材料的批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际，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比如，1958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刊有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红旗》杂志封面上批示：“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1959年11月，他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等三份材料上批示：“江青阅后，交林克阅，三件都可看”。1961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的指示》等两个文件上批示：“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材料。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1961年11月19日，他在一些材料上批示：“一批材料，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情况简报上批示：“此二件，江青阅。退毛。可看，很好。”其中一件是9月14日下午陈毅在华东组的发言。陈毅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即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即我们对亚、非、拉的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陈毅认为，“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对陈毅的观点，毛泽东显然很赞赏，便批给江青阅读。1962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读了《文艺报》第十二期刊登的三篇纪念《国际歌》作者的文章后批示：“江青，这里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毛泽东将内容如此广泛的材料批给江青阅读，是为了让她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掌握国内外动态。但是，在客观上，这对江青涉足政坛或介入某一方面的工作也起到了一种鼓励或推动的作用。比如，毛泽东指示江青阅读有关文艺的文章、文件，可以说对江青企图全面插手甚至控制文艺领域的努力起了某种强化作用。第二，批评性、限制性的批语没有了，耐心细致的指导多了。在这一时期的全部21篇文稿中，没有一篇包含批评江青的意图或倾向，也没有一篇包含要求她注意某些问题、遵守某些原则等方面的内容。转而代之的是耐心、细致的指导。在批语中，毛泽东常常教导江青要“仔细地”读，要“精读”。比如，1960年8月，他将委内瑞拉共产党一位领导人的谈话材料批给江青，要她“仔细地慢慢地看”。1961年6月，他在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批给江青时写道：“江青精读”。同时，毛泽东还常常提醒江青，仅仅阅读是不够的，还要“研究”材料。1960年6月，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之后在农得拉鲁公司举行的宴会上说，他在中国期间，看到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向前推进，并未受到损害。他认为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赶走了。当然革命流过血，使许多人掉了脑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看来不流血也没有办法。蒙哥马利说，他见到的中国领袖都是有学问的，并且是很有智慧的。他建议所有出席宴会的人都去读毛泽东有关战争的著作。他还得出了两条

结论性的认识，一是西方国家既然无办法消灭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找出办法同共产主义共存；二是在共存的同时，西方国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存自己的基督教文明基础，并把它发扬光大。毛泽东在读了蒙哥马利的演讲摘要后批示：“江青阅。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着重号为毛泽东所加）1963年9月26日，毛泽东将25日的《参考消息》批给江青，告诉她“第一版、第四版都要研究”。“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用谆谆教诲、悉心培养几个字来形容此时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是不为过的。

毛泽东如此广泛地让江青接触各方面的材料，以及他对江青的耐心、细致甚至是不厌其烦的指导，这既是对江青的关心，也是对她的一种支持。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同建国初期相比，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转变。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有两条：一是江青职务的变更。1956年，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江青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除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外，还负责收集和研究国际资料。二是党内高层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成绩与问题的估计上出现分歧。毛泽东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心生不满，这也在客观上给江青提供了可乘之机。比如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的那首著名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首诗于1963年公开发表），不论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都给江青提供了可观的政治资本。

### 3、6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政治上信任、倚重

从1964年至1969年九大召开，是毛泽东对江青信任、支持的五年。此时江青由幕后走到前台，在中国政坛迅速崛起。

江青在政坛上的崛起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在50年代，江青就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按：应为电影处处长——笔者）。但基本上实质挂衔不干事。进入60年代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发表了一个谈话。谈话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还说，文艺工作者搞好创作，要有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生活和练习基本功这三项过硬功夫，等等。6月4日，毛泽东在刊载这一谈话的《工作通讯》上批示：“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让江青去转达自己对林彪谈话的支持，这在客观上成了毛泽东鼓励江青由幕后走向前台的重要信号。仅仅过了十几天——6月23日，江青便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在讲话中说，对京剧演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那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以来十五年的现实生活，要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26日，毛泽东在江青讲话记录整理稿上批了5个字：“已阅，讲得好”。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从1964年8月到10月，他又连续四次将反映国内国际情况的材料批给江青阅读。毛泽东频频将材料批给江青，这件事本身体现了他对江青的器重。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透过《文稿》收录的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对江青进行培养的历史轨迹。从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批给江青的材料内容看，毛泽东的主要意图还是让江青了解国内外的情况。就国内而言，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教育几大方面，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如下内容：一是关于山西省举办农民讲习所的材料。毛泽东在《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的材料上批示：“江青阅。共四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该材料称，去冬至今春，山西省各市县普遍举办了农民讲习所，以毛主席的部分文章为主要学习内容，以搞思想运动为学

习方法。材料详尽介绍了搞思想运动的五个步骤。透过这些材料，善于投机的江青不会揣摩不到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倾向性。二是关于“四清”部署情况的材料。10月30日，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批城市“四清”部署情况简报上批示：“江青阅。大有希望，明冬后春可完。”而早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运动的搞法等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方法将他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思想、路线贯彻下去，但“四清”并未达到这样的目的，转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过程中，江青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她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就抄录到此——我已经抄录得够多的了（需要申明一点，我非常赞赏郑、常两位先生这种研究，即利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供的有关材料，研究建国后毛、江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他们这种研究大概是首例，是“破冰”之举，但对他们的观点我并非完全认同）。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应该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以后的情况，即毛、江在“文革”中政治关系的情况，我在已发表的文章中有所论述，因此也就不抄录郑、常二位的叙述和观点了。

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遵照毛的指示，在醒目位置发表经毛修改、定稿的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在胡乔木的十六首词中，毛最欣赏的是《沁园春·杭州感事》，其结句：“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是出自毛之手笔。“诗言志。”毛所以这样修改胡乔木的诗词，是很反映和代表他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心态的。毛说“谁共我”（胡乔木原文为“天共我”，毛将“天”改为“谁”——笔者），这不是表明他在找人吗？应该说，他找着了，找对了，能够与他相“共”的，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妻子江青——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也应了古人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遴选根本政治助手和支持者方面，江进入毛的视野。这是江在六十年代崛起的根本原因。形势有了需要，最高领导人（还是自己的丈夫）又赏识，江的机会到了，她也就紧紧抓住，乘势而起了。

1961年9月9日毛为江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这首七绝显然是赞扬和称颂江青的。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又和江青一起会晤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这仿佛是过去，特别是建国以来还没有过的事情。

江崛起的第一个大行动，就是从1962年起搞“京剧改革”（或叫“京剧革命”）。大家知道，在1963年和1964年，毛关于文学艺术工作有两个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第一个批示写道：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

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第二个批示写道：

这些协会（指关于文学艺术的各种组织，如文联、作协等等——笔者）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根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文学艺术工作所做的批评——严厉批评。江青搞“京剧改革”，就是根据毛泽东的这种精神或指示做的——追溯远一点的话，也就是贯彻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具体地说，江青表示，就是要在舞台上使工农兵的形象代替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形象。江青会同（江青自诩，也有很多人赞誉江青为“指导”或“领导”）北京和上海等地京剧界人士创作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各地京剧团也都排演了现代戏，如云南京剧团的《黛诺》、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等等，1964年6—7月在北京举行了有30多个剧目参加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这次活动中江青大出风头，她6月23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对江这个讲话，毛6月26日批示：“已阅，讲得好。”江这个讲话，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以《谈京剧革命》的题目发表（5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同1964年见诸文字的讲话相比，一字未改。《红旗》杂志为江讲话配发了《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指出：“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

“文革”中垄断、统治舞台和荧幕的八个样板戏，大多数脱胎于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优秀剧目。当然，我们不必讳言和否定江青在京剧改革中做的工作，她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亲眼看到，江青在用餐时，都经常听所谓“样板戏”的唱腔，她反复说“十年磨一戏”，一个戏要不断地改，等等），对这一点，业内人士有不少肯定的评论。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亦称头牌京剧女演员）、第一个在《沙家浜》中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虽在“文革”中被江整得遍体鳞伤，而在“文革”后仍然说：“平心而论，江青还是懂艺术的。”著名作家《沙家浜》编剧汪曾祺，曾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而其才华为江青赏识，在京剧改革中受到“重用”——语为“控制使用”，他自称“唯一可以在江青面前翘二郎腿和抽烟的人”，他真诚地认为：江青在高层领导中比较懂戏，对京剧比较内行，唱词好坏有鉴别力，有些话能说到点子上。比如至今耳熟能详、不少人都会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魁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研究京剧艺术的著名学者章诒和也说：“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内行。”但把京剧的所有功劳通通归在江身上，那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而在“文革”中，赞扬京剧改革，就是赞扬江青，却是一种时髦——一种自上而下所引发和倡导的时髦（这一方面有江的“贪功”，另一方面，在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并延及家人的情况下，也有不少人“抬轿子”、“吹喇叭”和“拍马屁”）。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1966年7月24日，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他在广播学院讲话，说：“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郭沫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时，朗诵了他作的一首诗，说是“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在座的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其中专门有关于江青的这样一段：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  
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着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江青，就是凭借着京剧改革这座“平台”、这个“阶梯”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或前台），又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她年轻时朋友郁风的话说：“演出（了）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结语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为，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和同伙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何让这样一个显赫一时的政治人物，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还是一个需要花大气力研究的课题。

江青如何从演员蓝苹，一步步演变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江青，其过程、轨迹、原因是什么？无疑这也是“江青学”中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本文已经不短，拟另为文阐述。简单地说，我有三句话：环境改变人；权力腐蚀人；外因起主要和决定作用。我提出这个问题，如有朋友有兴趣论说，我愿意倾听高见。“江青学”是一门大学问，不是哪一个英雄豪杰所能单独完成，它需要集体的力量，我愿意做其中一员，希望有意研究“江青学”的朋友，共同为之努力。

2012年12月写于北京东城沙滩北街2号院1号楼敬学轩

□ 《领导者·特刊》2013年第1期

~~~~~

【当事者言】

记张春桥阴险狡诈表现的若干事例

• 刘 岩 •

“四人帮”骨干张春桥的名字，我是在1958年9月看到《人民日报》发表其《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时知道的，从此对他的“左”倾思想留下了印象。“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到中央文革后的表现，不仅政治上“左”得出奇，品行上更是阴险狡诈、飞扬跋扈。他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我与他的办公室虽然在同一座大楼里，但他很少到总政上班，没有接触机会。我对他阴险狡诈的品质，在其就任总政治部主任以前就深有感受。

#### ◇ 张春桥充任“钦差大臣”，与姚文元在济南搞两面手法

1967年2月3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康生等人的授意和支持下，窜到济南夺了中共山东省委的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旋即，中央文革向济南军区发出了所谓“四个支持”的指示，即“支持王效禹、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支持‘三结合’、支持三大左派组织”。

济南军区党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对“文革”很不理解，但出于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基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组织纪律观念，对王效禹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和支持。军区党委确定，司令员杨得志分工参加省革委“三结合”，政委袁升平分工抓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支左指挥部”，全区抽调十几万名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这对稳定山东当时十分混乱的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革”初期“靠边站”的地方领导干部，大多被解放出来参加了“三结合”工作，分裂的群众组织联合了起来，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逐步恢复。

但是，这种局势没有维持多久，就被王效禹一伙破坏了。王效禹把群众组织划分为“革”与“保”两派，亲一派，压一派；把解放干部出来工作，说成是“走资派复辟”；把“三结合”的革委会，说成是“大杂烩”，要“踢开”“砸烂”；把抓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说成是“以生产压革命”；等等。济南军区党委与王效禹的分歧日益严重。

正在这时，江青等人在北京进行反所谓“二月逆流”和“带枪的刘邓路线”。王效禹一伙据此立即在全省发动了所谓反“逆流”运动，把矛头首先指向了“支左”的解放军。“揪出保守势力的黑后台”“拔掉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杨得志”“打倒杨国夫（参加省革委‘三结合’的军区副司令员）”等大幅标语和大字报，贴满济南和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因此，济南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电报，对王效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

4月30日，张春桥、姚文元声称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达济南。他们宣称“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正确解决山东问题”。为了表示“不偏不倚”，他们下飞机后不住军区招待所，也不住省革委会宾馆，而是就地住在飞机场。

我当时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和军区机关的广大干部心情一样，对张、姚“一碗水端平”的表态信以为真，以为他们会秉公执法，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军队与王效禹、社会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

张、姚住下不久，假惺惺地召集军队和地方的代表开座谈会，听取双方意见，并坐车去街上看大字报、大标语。张春桥在街上看到拥护解放军的标语后，原形毕露，情不自禁地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是‘老保’贴的！”陪同视察的袁升平政委回敬了他一句：“左派就不应该拥护解放军吗？”张春桥听了满脸不高兴，并怀恨在心，这成为他以后整袁升平的诱因。

在安排他们的活动日程时，张、姚自己提出分工：张春桥重点做“支左”解放军的工作，姚文元重点做两派群众的工作。军区党委尊重他们的意见，很快安排驻济南机关、部队的排以

上干部集会，请张春桥讲话，希望他能从军队与王效禹、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团结的愿望出发，发表双方都能接受的有利于问题解决的高见。

但是，张春桥向“八一”大礼堂里的1000多名军队干部讲的完全是王效禹欣赏的那一套陈词滥调。他大讲解放军要如何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介绍上海如何亲造反派、爱造反派、保护造反派、支持造反派，如何分化保守派、瓦解保守派、打垮保守派、消灭保守派的经验。他要求“支左”的指战员要“掉屁股，转弯子”，要“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的讲话，在军队极少数人员中起到了煽动作用，导致军队内部出现分裂现象，局势更为复杂。

张春桥的这次讲话助长了王效禹的反动气焰。两天后，他就制造了震惊全省的镇压一派群众的“五七”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在做两派群众工作的幌子下，决定在5月7日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但是，王效禹一伙按照张春桥介绍的上海对付“保守派”的经验，听报告的入场票只发给造反派，不发给保守派，这就引起了相当多群众的不满。从5月6日开始，陆续有人到省革委会去要听报告的入场票。王效禹设置圈套，诱使领不到票的一派群众，于当晚大量拥入省革委会大院。王效禹同时派人混入院内，胡写乱画，打砸器物，伪造现场，栽赃陷害要票的群众。5月7日凌晨4时，王效禹派出宣传车，宣布进入省革委会大院要票群众的行动，是“冲击省革委的反革命事件”。同时调集数万造反派，包围并冲入大院强行驱赶要票的群众，有近万人遭殴打。他们勒令每个人口衔稻草，高举双手做投降状，进行人身侮辱，并把300多人非法逮捕关押。

王效禹还企图把要票的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公开予以取缔。他拟出文稿，要求以济南军区与省革委会的名义，联合发文宣布。军区党委认为这不符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对待和处理大型群众组织的规定，拒绝签署。同时，杨得志与袁升平迅速找到张春桥、姚文元，请他们对此事表明态度。张春桥既不点头，又不摇头，板着面孔耍滑头说：“再考虑考虑。”其实，就在王效禹用棍棒驱赶进入省革委会大院要票的群众后，张春桥便紧握王效禹的手表示祝贺，姚文元跟着帮腔：“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永远和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 张春桥因四川会议放电影之事责令我和中办秘书写检讨

1972年3月，中央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的领导人员来京，在政治局直接领导下召开四川会议，解决四川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的问题。会址确定在京西宾馆，会务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和总政治部各派出一人承担。中央办公厅派出的是一位河南林县籍姓许的年轻人（我称他小许），总政治部确定派我参加。

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午夜2点，在总政大楼的办公室里，当面向我交代了任务。他说，上班后你就去京西宾馆报到，工作任务主要是作记录、写简报。实际上，我和小许两人除了作大会小会的会议记录，每天写一期会议简报外，还要安排与会人员的食宿和文娱活动，布置每次开会的会场，向有关方面转达与会同志提出的其他问题。将近一个月的会议，每天连续进行，不过星期日。我俩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写简报，8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都难以保证。

会议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大章和会议期间由广州军区调任成都军区的政委刘兴元担任召集人。四川来京全体人员，在开会前和会议结束时，两次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率政治局全体成员集体接见；中间每天的会议，一般都有政治局部分成员轮流参加，少则二三人，多时四五人，到会次数较多的是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等；其间，周恩来临时安排了一次范围

较大的接见活动——除参加四川会议的全体人员外，还有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区和广州军区的领导人。

3月15日晚饭后，小许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说周恩来晚上10点以后要到京西宾馆接见四川省和中南三省来京的同志，请会务组安排会场。我让小许请示作不作会议记录，因为那时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均使用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印制的记录本，每本50页，每一页都编有序号，封面上印有该记录本的使用会别、起止时间、编号、记录人的姓名等，特别正规。如果要作记录的话，我们去会议室时就必须把记录本带上。经中办请示周恩来，不用作记录。

晚上10点，我们请参加接见的领导同志，到京西宾馆会议楼的第二会议室集合。中共中央领导人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等也陆续到达。等到午夜过后，周恩来才忙完别的事情赶到京西宾馆。此时他还没顾不上吃晚饭，进入会议室同大家一一握手后，让会议楼的服务员转告厨师给他准备晚饭。饭送来了，周恩来坐在茶几前边吃边说，寒暄一阵后，向大家宣布了一些人事安排。接着，周恩来比较详细地谈了“九一三”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间有人插话问：“为什么不把飞机打下来，叫他跑出去了？”周恩来说：“林彪是副统帅，我们手里没有现在的这些材料，打下来怎么交代？”他用手指朝着会场四周的人来回点着问：“你们哪一个人当时敢下这个决心？”之后，周恩来接着回顾了中共历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越谈兴致越浓，从凌晨1点一口气谈到4点半，谈了3个半小时。

我从周恩来开始寒暄的语气看，感觉他可能要谈一些重要问题，所以顺手从会议桌里取出一些32开大小的便笺纸，私下里记录了他这次谈话的要点，至今保存完好。

那么，张春桥在四川会议上，为什么会为放电影的事情责令我和小许写检讨呢？

3月24日，四川会议的议程进行完毕，会上通过《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后，有几位同志向我和小许提出看电影的要求。我们请他们提个影片名称，大家提了《乔老爷上轿》等七八部。小许问我选哪一部，我说按官职大小选，谁官大按谁的意见定。于是就按刘兴元的意见，确定放映《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这部影片我和小许都没有看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但可以肯定是一部“封存片”，得写报告经一位政治局委员批准，才能到国家电影局取片子。

我和小许都觉得李先念“好说话”。于是，我俩给李先念写了借用影片的报告，他立即批示“同意”。当天下午，从东郊地下仓库里将影片借回。

吃过晚饭天黑后，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刚开始放映电影，中央办公厅来电话通知说，周恩来和政治局同志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四川会议人员。四川的同志虽全部撤走了，但电影不能停映，因为场内还有五名观众，其中一人是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当地部队军事首长熊某。

熊某与另一位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当地部队政治首长南某，几天前来到北京，准备参加政治局召开的浙江会议，也住在京西宾馆。中央办公厅委托四川会议会务组代为照料他们。我和小许觉得南、熊晚上没有事干，可以看看电影。小许通知他俩后，南是浙江省的第一把手，在浙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没有心思看电影，只有熊前往观看。

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通知小许，张春桥和姚文元上午9点要到京西宾馆接见南、熊，让做好准备。8点30分以前，我俩到会议楼布置好会场，然后下楼在礼堂后院等待他俩的到来。不一会儿，张、姚共乘一辆红旗轿车来了。我俩将他们引入会议室后，张春桥看到我们带着会议记录本，便说：“不作记录，你们回去吧。”



我们回到主楼11层住处后，以为上午可以轻松一下了。小许守电话，我下到一楼小卖部购物。东西还没有买上，小许便拿着记录本急匆匆地往会议楼赶，一面紧走一面朝我喊：“老刘，叫呢！”我说：“你先去，我赶紧回去拿记录本，戴帽子，随后就到。”我上楼取了东西，赶到会议楼，按下电梯按钮等待上楼时，电梯从楼上下来，门一打开，小许从里面出来了，让我回去。我从他的脸色看，估计是出什么事了。到11楼后，小许才说：“他们追问昨晚的电影是谁让放的，质问放这种‘封、资、修’的电影，与‘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关系，对解决四川问题有什么帮助，你们知不知道这是部香港出的电影，是禁止看的！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们要写出深刻检讨！”

小许出了会议室，从在走廊里休息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口中，才知道是熊某告诉张、姚二人的。原来，我和小许从会议室里退出后，张春桥在谈正事之前，问南、熊这几天都干什么事了。熊说：“昨晚看了场《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电影，乱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嘛！”

最后，由我俩签字送上去一份检讨书，大意是：由于我们学习不够，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又缺乏文艺方面的常识，不知道电影《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是哪里拍的，演的是什么内容，更没有与路线斗争和解决四川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只是觉得四川来京同志紧张地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很辛苦，精神上应放松一下。我们听说有这样一部逗乐的影片，就自作主张盲目地借来放了。四川的同志基本上没有看成，刚看了个头就去人民大会堂了。我们诚恳地接受首长的批评，认真吸取教训，保证今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午饭前，张、姚还没有离开京西宾馆，小许把检讨书送给他们的秘书。后来小许告诉我，他听钓鱼台的某秘书讲，我们的检讨书，张、姚看过后，转送给了江青。

#### ◇ 张春桥在江西会议期间逢迎江青，反复折腾换会场

1972年3月下旬，四川会议结束后，政治局接着召开了江西会议和浙江会议。我和小许负责江西会议的会务工作。

江西会议主要是解决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揭开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会议开始指定的牵头人是程世清，但他除了在我们每天写的会议简报上签字外，其他行政方面的工作都由省委副书记白栋材具体负责；文字方面的工作由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黄知真负责。会议进行到后期，中央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来京接替程世清担任会议主持人。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在政治局集体接见参会人员时指示，会议首先要安排一项议程，就是与会全体人员集体参观毛家湾林彪住所。周恩来说：“程世清同志，明天你到毛家湾看看，林彪的住所是否像你《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文章宣传的那样，为了坚持艰苦朴素，用煤球炉子取暖……看看你们江西给林彪制造的水陆两用汽车。”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许事先进行了到参观现场后的分工，我负责参观队伍的收尾工作，防止有人掉队；小许专门跟随程世清，观察他在参观中的情绪变化。整个参观过程中，程世清的情绪十分低落，特别是看到院子里停放的水陆两用吉普车时，表情很不自然，随后就径直走到停车处，一屁股坐进车内，靠在车座的后背上，仰头闭眼，连续骂了几声。程世清的这些表现，我们不能写在简报里，因为简报需要由他签发，所以就用我和小许的名义，写了一份《情况反映》的手抄件，呈送上去。

后来，又陆续有些事情需要用这种方式向上汇报，当我们第三次写时，觉得应该编个号，以免忘记送的次数，于是就编了个“第三号”。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大概觉得我们这次反映的情况比较重要，就送给了毛泽东参阅。毛泽东看到这是“第三号”了，提出要看第一、第二号。因毛泽东索要前两次《情况反映》，中央办公厅通知了小许，说今后的《情况反映》，每次都要呈报毛主席，并发政治局成员，要改成铅印。

我和小许开始手写的《情况反映》，每次也就两页纸，内容单一，竟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对江西会议是很重视的。

然而，江青却是另外一种态度。江青参加江西会议次数不是很多，但在解决江西路线问题这样严肃的会议上，表现得很不严肃。张春桥则极尽逢迎巴结之能事。

有一天上午的会议，政治局成员中江青和张春桥出席。按惯例，我们仍将会场准备在第二会议室。江青和张春桥进入会议室，还没有说开会的事，江青就提出：“这么大的会场，空荡荡的，换个小点的地方嘛。”

张春桥马上点头哈腰地从第二会议室出去，亲自找会议楼的工作人员带领他选择另外的会场。不一会儿，张春桥回来招呼大家换会场。他选定的是第二会议室往南，窗户同样朝东，没有沙发，只有会议桌和椅子的一间小会议室。

大家搬过去就位后，开始发言。江青说房子里有风，张春桥马上站起来，跑到窗户前查看何处漏风。他没有发现漏风的地方，说可能是窗户的朝向问题，便让会议楼的工作人员再次领他去找窗户朝南的房子。张春桥找好后，返回来带领大家再次换会场。

转移到第三个会场后不久，江青说她还没有吃早饭。张春桥便出去让服务员找厨师为江青备餐。不一会儿，服务员将饭送来，江青不肯在会议桌上当着大家的面吃，张春桥就陪她出去另找吃饭的房间。江青吃完饭后，不想返回大家等候她的这间会议室了，张春桥又招呼人们换到江青吃过饭的地方。人们跟着张春桥过去一看，还是江青认为“有风”的那间会议室。就这样，会议室的数次搬迁，加上江青吃饭，折腾了约两个小时，上午的会基本上没有开成。当时，我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出现张春桥在别的场合飞扬跋扈的情景，与他当天对江青阿谀奉承的奴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 ◇ 张春桥在江西会议的简报上给江青写开脱“证明”

江西会议正式开始后，程世清首先作检查发言，大家听了很不满意。他连最起码的一些事实都没有交代清楚。比如，程世清陪林彪从九江上庐山，是否与林彪坐在一辆车内？周宇驰1971年8月驾直升机去汕头找林立果，路经南昌时与程世清是否接触过？

那天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参加了会议，他们询问这些情况时，程世清总是以“记不清了”搪塞。比如，他说“接林彪上庐山，我是坐的我的车呢，还是坐的林彪的车，实在记不得了，你们可以问问我的司机，他应该记得”，“周宇驰到南昌的事，我怎么就没印象呢”。

我们作记录的人员看到这种场面，也感到着急。李先念事先曾跟我和小许说：“你们对会议的开法，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可以提出来。”于是，我把“九一三”事件以后参加总政工作组，进驻空军三十四师期间，副师长王焕今向我们详细交代的他陪同周宇驰（王是带周宇驰学直升机的教练），驾驶云雀直升机在南昌会见程世清的情况，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李德生。

李德生宣读了王焕今交代的情况后，程世清当即交代了他那次会见周宇驰的经过。在当天晚上举行的没有政治局成员参加的小组会上，程世清一口气把他与林彪及其党羽的来往情况，比较详细地讲了出来。

第二天，在有好几位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上，程世清作了进一步的交代检讨，我们在简报中作了反映。当天午夜，江青却在这期简报的传阅草稿上批了“造谣”二字。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折腾了半夜又半天，才使风波平息下来。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按照当时中央对会议简报出台流程的规定，我们草拟的简报初稿，会议召集人签署后，先呈送中央办公厅，初审通过后排印出清样稿，再送当天出席会议的每位政治局委员过目，无异议后才能定稿印刷发出。江青参加了当天的会议，所以这期简报清样稿得送她过目。午夜时分，她审阅时，在一句话的下面画了一道横杠，打箭头到一旁，恶狠狠地批了“造谣”两个大字。

传送稿子的工作人员不敢怠慢，马上报告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星夜赶到京西宾馆，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安慰我和小许说：“江青同志不是说你们写简报的同志造谣，是说程世清造谣。上班以后，你们找春桥同志问问，在庐山的那天会上，这句话江青同志到底是怎么说的，春桥同志那天参加了华东组会议。”

程世清在检讨到关于他在庐山会议华东组会上，表态同意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意见，拥护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说：“那天，江青同志在华东组会上，本来就明确指出，宪法上如果写上设国家主席，有人就会伸手，但是我还执迷不悟……”江青否认她说过“有人就会伸手”的话，指责是程世清“造谣”。汪东兴让我们找张春桥，核实的就是这句话。

上午上班后，张春桥在京西宾馆参加浙江会议。小许因害怕张春桥，就让我去问他。我将简报清样稿中江青批有“造谣”字样的那一页纸翻到上面，进到第二会议室，绕到张春桥坐的沙发背后，一面把简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一面凑近他的耳朵说：“东兴同志请你回忆一下这句话的情况。”

张春桥没有回头看一眼找他的是谁，便拿起简报稿子看了一会儿，又翻了翻前后页，拿起笔在简报前页纸的空白背面，写了两行字，大意是：江青同志那天没有说过“有人就会伸手”的话，她是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就会有人觊觎。

张春桥否定了江青说过“有人就会伸手”的话，起到为江青开脱的作用。但是，我觉得从张春桥写的全文看，并不能说明程世清是凭空捏造，即“造谣”。因为“觊觎”一词有希望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意思。在简报上怎么处理这一情况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我想出一个办法，小许也表示了同意。我把程世清的原话保留不动，在江青打了横杠的字后面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春桥同志注：”，在冒号后面，原封不动地引入张春桥写的那段话。这样等于是让张春桥在此给江青写了一个“证明”，即江青那天说的话，不是“有人就会伸手”。简报稿作了这样的处理后，即报送给汪东兴，之后没有人为此事再找我们。

◇ 张春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突然夹起皮包要退席

张春桥成为中央军委领导机构的成员，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并确定张春桥为办公会议成员。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文件。文件中称：“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干、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后，办公地址设在景山西边的三座门。1973年3月，我随总政治部赴昆明军区工作组组长、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到三座门会议楼一层会议室汇报工作。魏伯亭带着打印的《汇报提纲》准备汇报时，张春桥忽然从沙发上跳起来，夹起皮包，用食指指着魏伯亭手里的《汇报提纲》，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你是不是要念稿子呀？你要是念稿子，我马上就走！”

张春桥的拙劣表演，使与会者都目瞪口呆。片刻之后，叶剑英出面圆场说：“魏伯亭同志，你就抓住主要问题说吧，一些具体数字我们看材料好了。”

魏伯亭是从全军优秀的军政治委员中选拔到总政工作的。他政治工作经验丰富，思路清晰，经过各级政治主官岗位的锻炼，口才不错，下部队检查工作的情况，不用稿子也可以讲清楚。但是，他这次带工作组去昆明军区，周恩来和李先念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要顺便调查一下贵州的“抓革命促生产”情况（贵州省在昆明军区管辖范围内），重点是了解贵阳钢铁厂的生产恢复情况。

总政工作组从昆明转到贵阳后，除了对贵州省军区系统的“批林整风”运动进展情况进行调研外，魏伯亭还带一部分人在贵阳调查，并派出一个小组到遵义地区调查了解“支左”部队在地方“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这对工作组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搜集的很多资料，特别是一些具体数据，凭脑子很难记清楚，所以我们为其整理了一份材料。

叶剑英指示后，魏伯亭把《汇报提纲》丢在一旁，开始汇报。坐在后排的我一面听着汇报，一面看着《汇报提纲》，发现他汇报的内容与原来准备的材料基本上一致。汇报中间，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插话询问一些情况，张春桥则一言不发。这大概是他对“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不感兴趣，加上会议开始时的火气尚未消除的原因吧。

□ 原载《党史博览》2013年第1期

~~~~~

【史海钩沉】

华国锋何时约见李鑫

• 李海文 •

《百年潮》2012年第10期发表武健华的文章《详忆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讲到：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大会议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9月10日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等等。李鑫还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康生秘书），对“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知道一些。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政治局开会前，他们

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了，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了解和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提的意见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人民大会堂，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下决心。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处，和华国锋谈了“四人帮”在钓鱼台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李鑫在华国锋家里吃的晚饭，边吃边谈。当天夜里，李鑫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思。

粉碎“四人帮”不久，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是李鑫最早向华国锋提出粉碎“四人帮”的。笔者从1985年开始曾多次采访过华国锋同志，为此，我曾专门请教过华国锋。他多次回忆，每次回忆谈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他做事严谨，特别交给我李鑫写的求见信的复印件，足以证明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而武建华在《百年潮》发表的文章中沿用的还是社会上流传的不准确说法。现将我了解到的事实记述如下，以飨读者。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后，华国锋一直没有回家，住在中南海的202，即毛泽东逝世的地方。一直到9月18日下午毛泽东追悼会结束，华国锋将毛泽东的遗体护送“769”保护室。

华国锋回忆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毛主席逝世后，9月10日就开始考虑。9月11日，我以看病为由从毛泽东灵堂离开，去了李先念家，请李先念去西山找叶剑英，征询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毛泽东的追悼会结束后，华国锋才回家休息。叶剑英很快知道了，到华国锋所住的东交民巷15号院来商议。会面后，华国锋首先提出：“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只能采取断然措施，把他们抓起来，隔离审查，然后公布罪证。”他的提议得到叶帅的完全支持。同时，华国锋多次强调，这个话必须是他先说。

23日下午或晚上，华国锋约汪东兴到15号院谈话。汪东兴进屋时手里拿着几张纸，坐下后，将纸放在华国锋的面前，说：我带了几条语录，你可以在会上用。

华国锋拿过一看，字有核桃大，是汪东兴自己手抄的语录，有四五张纸。华国锋没有细看就放下，说：斗争发展了，不能再拿语录斗争了。现在开会解决不了“四人帮”的问题，需要另想办法。我看只能采取断然措施，把他们抓起来，隔离审查，然后公布罪证。就像当年毛主席、周总理处理林彪死党一样。对黄、吴、李、邱不就是隔离审查吗！不费一枪一弹解决问题。这样处理引起的震动小，不会造成全国混乱，损失小。这个事在毛主席病重时不能做，在丧事期间也没有办法做，也不能做，丧事一办完，时机到了。我们不动手，“四人帮”就动手。

李鑫曾向汪东兴提出采用隔离审查的办法。汪东兴心里赞成，但是他没有权力这样做。华国锋敢于下这个决心，他非常高兴，拿回带来的那几条语录。

华国锋与汪东兴商量行动具体细节，意见完全一致，还越谈越细。

最后华国锋问：准备工作需要多长时间？

汪东兴回答：约一个月，我要一个一个谈。

华国锋立即否定：时间太长了，能不能抓紧一点，缩短一些，不然夜长梦多。我们对“四人帮”的势力，不能估计过高，也不能小看他们。他们还有不少爪牙，还迷惑了相当一部分群众。军队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过去了，这一点要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汪临走时说：李鑫想见你，想约个时间。

华国锋说：可以。

23日，华国锋同意中办副主任李鑫，汪东兴回去后转告李鑫。李鑫很高兴，25日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华第一副主席：

送上姚文元同志九月二十三日的信，请您一阅。

出版《毛选》五卷是全党大事，似以向中央政治局作一次详细汇报为好。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更加迫切地要求早日出版《毛选》五卷。为了尽快完成这个任务，我建议，请中央成立以您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至于具体办事机构，建议撤消胡乔木的工作，请汪东兴同志负责。这对在编辑工作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路线，加强毛主席文稿的保存管理，都有利。

我请求您抽时间接见我一次，以便面会。可否，请批示。

李鑫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李鑫在信里还附上姚文元写给李鑫的信，全文如下：

李鑫同志：

请给我一个材料：现在的《毛选》五卷共几稿，其中公开发表过的几篇，有手稿的几篇，两者一共多少字。根据讲话整理的几篇，列出目录，说明哪些经主席看过。

对于如何早日做好《毛选》五卷编辑出版工作，有何建议，也请告。

姚文元

九月二十三夜

李鑫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1926年出生在南昌市，1947年11月在南开大学参加了民主同盟，194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转移到冀中解放区，在泊镇华北局城工部学习，1949年1月分配到天津市委宣传部任秘书、科长等职。1953年1月调到高教部工作，任副科长、科长。1958年9月起，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担任康生的秘书。“文革”后，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文革”后期，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领导成员，和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负责起草文件。粉碎“四人帮”的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四人帮”专案组，由华国锋亲自挂帅，成员是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下设办公室由汪东兴、李鑫负责。1976年11月李鑫任中办副主任。

华国锋收到李鑫的信，决定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和李鑫谈话。会面地点在中南海而不是15号院，国务院会议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一墙之隔。

华国锋回忆，李鑫在谈话中对“四人帮”有批评。李谈了对“四人帮”的一些看法。说出版《毛选》英文版，康生对“四人帮”就有意见。他主要讲《毛选》五卷的问题，康生活着时是康生负责《毛选》五卷，现在姚文元想抓过去，张春桥也想插手，不能让他们插手。他建议

华国锋听一次关于《毛选》五卷的汇报。他说要接受苏联的教训，对“四人帮”要早些动手。“四人帮”太猖狂，抢班夺权，值得警惕。

李鑫是否明确向华国锋提出隔离审查的建议，华已记不清了。

华国锋认真、仔细地听他讲，但是未同他深谈。特别是关于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这要高度保密的，不能透露，知道的范围越小越好。整个部署正在紧张地进行中，不能与李鑫谈。华国锋只告他：“要提高警惕。出《毛选》五卷问题，待中央讨论后再说，现在不是当务之急，你的信和姚给你的信我都看到了，放一放再研究。”

那华国锋和李鑫的会面到底是哪一天呢？为此，笔者专门给李鑫之子李赤子打电话请教。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李赤子从云南插队8年，刚回到北京不久，与父母同住，他多次听到父亲回忆：29日下午见到华国锋谈了四个多小时，建议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无论是晚上还是下午，这只是细节的不同。相同之处是在9月下旬见的面。

李鑫、汪东兴、华国锋都回忆华国锋只见过一次李鑫，现在的分歧在于见面时间是9月14日还是29日？笔者认为29日有充分依据。第一，有李鑫9月25日给华国锋信为证，如14日已见过面，他不会25日给华国锋再写信，要求面谈；第二，9月14日时正忙于毛泽东的丧事，华国锋也没有时间和别人谈话；第三，9月18日之前华国锋一直住在中南海，没有回过家；第四，9月29日与华国锋见面，是李鑫于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回忆，此时离俩人谈话的时间只有两年多。这个记忆比较准确。

尽管12日李鑫同汪东兴谈话时，提出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但是他同华国锋谈话时，华国锋早已决定隔离审查“四人帮”。用隔离的方式华国锋在10日就已决定了。

华国锋说：李鑫能对“四人帮”有认识，并能想到隔离审查的办法，这是好的。

李鑫对粉碎“四人帮”的贡献得到肯定，他逝世后，他的生平中这样写道：“1976年9月，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紧要关头，李鑫不顾个人安危，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

□ 原载《百年潮》2013年第2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